

重走重慶解放之路

軍事①

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特別報道

运筹帷幄 向西揮戈橫掃千軍

□文/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 韓毅 圖/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 解小溪

雕花飛檐、鑲耳山牆、飛閣流丹……8月11日，一場短時強降雨澆滅了羊城的暑氣，走進廣州海珠國家濕地公園，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與劉蒙將軍約見於此。

“辛苦你們了，這麼遠還專程趕來採訪。”儘管已年至古稀，老將軍目光炯炯，精神矍鑠，說話聲音山響，偶伴開州鄉音，舉手投足間，盡顯軍人本色。

“橫看縱觀進入歷史 周道坦蕩悟出人生”——我們的“重走重慶解放之路”採訪，就從劉蒙將軍贈予記者的一副親筆手書對聯開始。

主席點兵，劉鄧大軍受命揮戈向西

劉將軍的這副對聯，筆力遒勁，氣勢磅礴，且字字精妙。

“橫看縱觀”，展現了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整體性原則作為理論依據的大歷史觀；“悟出人生”，則展現了他的“讀史明智，鑒往知來”的人生信條。

這也完美契合了本次重慶日報推出“重走重慶解放之路”系列報道的初衷。

“解放重慶，得從毛澤東主席落子西南談起。”贈送了一副對聯，劉將軍又從挎包裏掏出他新近創作的大型歷史電影《鐘山風雲》劇本，向記者展示了劇本中的一個場景：

劉伯承對他的副官說：你把這本進軍西南的武器裝備清單送給王治城，他還在金陵兵工廠加班，讓他儘快完成。

張二勇（劉伯承的副官）：是（張轉身準備出去，緊接着又扭頭）。

張二勇：外面下雨了，我擔心您的腿，一下雨就痛。我和榮華同志想給你買一點藥……（劉伯承打斷張二勇）

劉伯承：這點小病，不會妨礙我們進軍西南，快去送資料。

張二勇（立正，敬禮）：是，西南解放了，和公司員一起回家……

劇本中這一精彩橋段，生動講述了劉伯承“告別中山陵，準備進軍西南，完成他一生夙願”的場景。

劉蒙，劉伯承次子，畢業於清華大學，從事過科研工作，當過部隊指揮員、軍事外交官、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少將軍銜，並參與過《劉伯承傳記》編寫，創作有電影文學劇本《青年劉伯承》等，對那段歷史了然於胸。

撫今追昔，時空穿越。

1949年4月下旬，北平香山雙清別墅，綠蔭環抱，清幽靜謐。毛澤東剛用完早餐，正在涼亭中小憩，秘書就興奮地帶來了南京解放的捷報。

看完捷報，毛澤東回到屋內，走到牆上懸掛的巨幅地圖前，目光從南京向華南、西南和西北延伸，眉頭時而緊皺時而舒展。

不久，周恩來也走進房間。毛澤東說：“原定二野兩年內留華東，不作新的機動，以防備美帝國主義於我軍渡江之後可能進行的干涉，現在看來，美國直接干涉的可能性不大，二野下一步進軍西南的行動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了。”【摘自郭娟娟《重慶解放實錄》，原載於《黨史縱覽》2019年第8期】

1949年5月23日，中央軍委作出了向全國進軍的部署，明確指出：“二野亦應準備於2個月後，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該部署還指出，二野目前協助三野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干涉，是必須的，使美國有所畏而不敢出兵，但在上海、寧波、福州等處被我軍占領後，美國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那時二野就可以西進了。

“把進軍大西南的任務交給二野，顯示了毛澤東對這支英雄部队的青睞。”劉蒙說，此時的二野下轄3個兵團、9個軍，可謂兵強馬壯。對由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李達等人組成的久經沙場的二野領導機構，毛澤東更是信賴有加。

同年6月17日，中央軍委再次電告劉伯承、鄧小平：“二野西進時機，似以9月較為適宜。一則準備時機充裕；二則沿途那時才能有糧食；三則四野主力（7個軍）9月可到柳州，11月可能占廣州，迫使廣州偽政府遷至重慶，然後爭取重慶較為有利。”【原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8冊】

按照黨中央指示，剛經過渡江戰役洗禮不久的二野，馬不停蹄，人不卸甲，開始謀劃進軍西南的方案。1949年7月中旬，二野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和二野前委在全面分析敵情之後，在南京召開二野高干會議，研究制定進軍西南的作戰方針。

上兵伐謀，“大迂回”聚敵歼之

西南地區尤其重慶渝東北、渝東南地區，山高林密，



▲西南服務團經百陽南川，日夜兼程向重慶挺進。（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供圖）

▲8月11日，廣州海珠國家濕地公園，劉伯承元帥次子劉蒙贈予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親筆手書對聯。

溝壑密布，歷來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那麼，進軍西南，二野如何排兵布陣？

在重慶市委宣傳部原常務副部長、重慶史研究会名譽會長、著名文史專家周勇的辦公室，他打開了一本《重慶解放》檔案集。

“重慶及西南地區難打，蔣介石自然深知這一點。”他說，在蔣介石看來，西南地區有可資據守的政治和地理條件。為此，國民黨成立非常委員會，通過《扭轉時局方案》，蔣介石再次出山，於1949年8月24日飛抵重慶，決心在西南地區進行最後抵抗，並隨即提出了以雲貴川康為後方基地，“建都重慶，確保大西南”的方針，靜待國際事變，以圖東山再起。

在作戰上，蔣介石精心構築以重慶為指揮中心、四川為主要據點、川陝邊為守衛重點、陝南陝東為決戰地帶的“大西南防線”，總兵力達到90多萬人，企圖以嫡系胡宗南集團等扼守秦嶺等天險，阻止解放軍入川；以白崇禧集團等組織湘粵聯防，憑借兩廣作為固守西南的掩護。如廣東不保，白部退入廣西，與四川胡宗南部遙相呼應，聯絡雲貴軍閥共同頑抗，以待時機。如此布陣後，蔣介石得意地提出“軍事西南，政治台灣”。

“蔣介石以嫡系胡宗南集團扼守秦嶺天險，阻我解放軍由此入川，主要是考慮到川北既是解放軍入川捷徑，又有陝海鐵路與老解放區相連，補給問題較易解決。”劉蒙稱，所以，蔣介石國民黨判斷我軍主力最大可能由這一方向入川（我地下黨組織通過秘密關係，強化了敵人這種誤判）。

面對蔣介石的布陣，解放軍如何應對呢？翻開一張泛黃的《進軍大西南態勢圖》，周勇稱，從該態勢圖上看，可以清楚看到我軍“圍三闖一”的經典布局，其中有虛有實、有真有假。

1949年7月14日，鄧小平奉命首次到北平（現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籌劃了二野等進軍西南的戰役部署。

毛澤東、鄧小平等決定：劉鄧共五十萬人，除陳賡現率之四個軍外，其主力決於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

川，另由賀龍率10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鄧賀等同志組成西南局，經營川、滇、黔、康四省。對白崇禧及西南各省之敵作戰時均採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打之之戰術方針。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為徹底切斷敵人的退路，封閉敵於西南境內予以全殲，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李達等經過反復研究，於1949年8月19日擬定了《川黔進軍作戰的基本命令》上報軍委並告華中局。

該命令明確了各部隊的基本任務，即“在於攻取貴陽及川東南，以大迂回之動作，先進攻宜賓、瀘縣、江津地帶之敵，並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宋希濂、孫震（當時分別擔任國民黨軍川湘鄂邊區和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于川東地區，爾後即聚歼這些敵人或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我軍逐次解決全川問題。”【原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8冊）】

同時，該命令對各部隊的行動進行了部署：五、三兩兵團，第一步必須於十月十日以前分別到達武岡、邵陽、湘潭之線和常德、江陵之線；第二步於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分別攻占貴陽、黔西和遵義、彭水、黔江；第三步分別經過畢節進占宜賓至納溪地帶之敵和進占瀘縣至江津地帶之敵。

“由此可見，這一部署完全避開了胡宗南集團、白崇禧集團的防守重點，從蔣介石所謂‘大西南防線’最薄弱的川東南入手。”劉蒙說。

按照“大迂回、大包圍、大殲滅”軍事戰略方針，黨中央決定賀龍率領第18兵團從陝西省南部進入四川，配合第二野戰軍主力解放西南，但“胡奸作戰時間，不應太早，應待二野進到叙、瀘、重慶一線，然後發起攻擊，時間大致在12月中旬”；四野則向廣西進軍，以大迂回抄斷白崇禧集團退雲南之路，防止其“確保左右兩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瓊”。

除了軍事準備外，二野還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從7月開始就進行休整。當時，部分指戰員有畏難怕苦思想和保守思想，認為西南偏僻，山多路遠，地瘠民貧，怕回

不了家。

為此，鄧小平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決定在進軍動員的同時，開展政治教育，以加強人民、祖國的國家觀念，愛護人民、祖國財產，反對本位主義，反對叫苦和功臣自居、驕傲自滿思想。二野直屬隊還及時召開黨代表會議，一面檢討，一面提出建議，從思想上解決畏難情緒。

不僅如此，劉伯承認為“沒有文化的部隊是無法完成中央下達的解放西南任務”。二野選調了到西南工作的地方幹部4800餘人，在京滬招收青年學生約1萬人，組成西南服務團，在解放西南中做群眾工作，並協助建設西南。由此，二野完成了進軍西南的所有戰前準備。

聲東擊西，用兵如神橫掃千軍

劉伯承在參加完開國大典及其後的相关會議後，於10月23日同鄧小平一起乘列車從北京南下，與由南京北上的張際春、李達率二野領導機關會合，在到達鄭州時，參加了各界民眾舉行的盛大熱烈歡迎大會，並公開露面和講話，新華社還專門為此播發了消息。

“這實際是他們在巧妙運用聲東擊西的計謀迷惑敵人，目的是把蔣介石在川東、黔東防守的部隊盡量北調，以達成二野主力部隊在這一地區實施正面攻擊的突然性。對劉鄧的妙計，毛澤東還曾言簡意賅地加以概括：劉鄧‘由京經漢赴湘，指揮二野向四川進軍’。三、五兩兵團补齐棉衣，‘進至湘黔邊境待命’。”劉蒙說。

然而，就在蔣介石把主力部隊調到川北實施重點防禦而洋洋得意時，二野主力卻已秘密地開往湘西常德和邵陽地區迅速集結。二野的領導機關離開鄭州後，也沒有西進，而是秘密南下，抵達武漢。

這時，在連接西南和西北的秦嶺一線，解放軍第18兵團和胡宗南集團却在“輕鬆”地对峙著，一面是進而不快、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舉棋不定。

而在長江以南寬廣的戰場上，二、四兩大野戰軍則形成了奇特的反差：公開向華南進軍的四野，浩浩蕩蕩，鑼鼓喧天；秘密向西南進軍的二野，偃旗息鼓，不顯跡，但一道戰術命令，却悄然傳達到參戰部隊的指揮員中間，並隨即變成指戰員們的堅決行動。

就這樣，解放大西南，在我方統帥部的精心運籌中驟然拉開帷幕。

1949年11月1日，在四野發起廣西戰役同時，劉鄧指揮二野主力等，在北起湖北巴東、南至貴州天柱，寬約500公里地段，突然向敵實施多路進擊，立即打亂了蔣介石在西南的整個防禦作戰部署。其中，川東南之敵企圖重新布防，確保西南敵主力側方安全。我軍各部則排除萬難，加速前進，不僅粉碎了國民黨軍“川湘鄂邊防線”，還攔腰斬斷了其大西南防線，既打破了白崇禧部西撤貴州的企圖，又直接威脅著川北胡宗南部的退路。

至此，蔣介石才如夢方醒，深感“川黔局勢日趨嚴重，大禍迫在眉睫”。1949年11月30日凌晨，蔣介石在白市驛機場的專機上度過了驚惶一夜後，飛逃成都。

同日，解放軍先頭部隊進入重慶市區，重慶市區宣告解放。山城破曉，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從這一天起，重慶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告別苦難，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和新重慶的道路。

“解放軍以少勝多的案例不少，但解放西南、解放重慶之戰，堪稱中國軍事史乃至世界軍事史的经典案例。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它丰厚的歷史內涵依舊具有穿越時空的价值。我們要發揚先輩‘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的精神，讀史明智，苦練真本領、真功夫，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航船劈波斬浪、一往無前貢獻力量。”採訪結束時，劉蒙如此寄語讀者。



扫码進入重慶互動融媒体作品《点亮！重走重慶解放之路》，一起点亮行進路線。作品將每天持續更新進度，您可以全程參與、沉浸式體驗。

